

新历史主义 批评与实践

Theory and Practice of New Historic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calization of Western

Literary Theories

卢絮 著

——基于西方文论本土化的一种考察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新历史主义 批评与实践

——基于西方文论本土化的一种考察

卢絮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历史主义批评与实践:基于西方文论本土化的一种考察/卢絮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1

ISBN 978-7-5161-7033-5

I. ①新… II. ①卢… III. ①中国文学—文学评论—文学理论—研究 IV. ①I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62514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席建海
责任校对 郝阳洋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7.25
插 页 2
字 数 269 千字
定 价 6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华南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编号：SKXSZZ 1406

序

在时间和空间的交织中进行思考

卢絮的博士论文《新历史主义批评与实践——基于西方文论本土化的一种考察》即将付梓，嘱我作序。我基于两方面的考虑同意做这个事。其一，作为卢絮的博士指导教师，她的学位论文我负有相关责任。最初的选题等工作我要参与意见，这是职责所在；那么现在出版时的作序，就算是这一工作的最后一程，我没有理由拒绝。其二，作序带有一些对于著作的肯定的性质，但更主要的是为读者推荐，简要说明著作的特色或者出彩之处，甚或也指陈其中不足等，它是阅读正文前的一个提示，这是我认为很有必要的。

我的序的题目“在时间和空间的交织中进行思考”，是说明卢絮论文的这样一个特点，即论文的论述对象是“新历史主义批评”，它是关注历史的，而且是历史上时间范畴中的；同时，这种论述不是简单地回溯新历史主义批评的发展过程，而是把它引进到中国之后的本土化过程联系起来思考，这个本土化的进程是涉及空间的。所以，论文既是在时间中的思考，也是在空间中的思考，它更是在时间和空间的交织中思考。

作为在时间轴的思考，论文追溯了新历史主义批评的发展脉络，这种追溯其实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逻辑角度的，即探寻新历史主义思想的来龙去脉，它的所来何自，也就是说明它的思想基础、它的思想前

驱等；时间轴的另一方面则是进行历史线索的追寻，一步步进行实证性质的考察。应该说，卢絮这一工作是做得很细的，她既要考察源自美国的新历史主义的文献材料，也要追寻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译介的中文材料，阅读量非常大。我所用的“非常大”这个词中，不是随意说的，读者可以看参考文献，林林总总约五百多种参考资料，这些资料不是泛泛的文艺学这个框架下的参考文献，而是基本上可以落实到新历史主义范畴中的。在此我也顺便应该致谢一下文艺学教研室的李松老师，在卢絮写博士论文期间，李松正值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李松在哈佛大学图书馆下载了一些英文材料，这是武汉大学图书馆甚至国内不能查阅到的，毕竟我们国内的图书馆也不会全数收录英语图书和专业刊物，李松提供的材料为卢絮创作论文提供了很直接的帮助。

空间维度的思考，则是卢絮这篇论文更主要的方面。所谓空间维度，就在于新历史主义批评作为一种文学研究的路径、方式，源自于欧美尤其是美国，而论文要考察它传播到中国之后的情况，西学东渐涉及空间的位移。在论文里包含了几个层次来进行梳理。

第一个层次，是对新历史主义批评的译介和述论加以回溯，其中译介注重客观，述论则要表达研究者的主体立场和思考，两方面其实也有关联，译介需要客观也需要见识，客观角度似乎就只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可是，对于这些学术性、理论性的内容，如果不进行一定程度的消化，即使复述也可能抓不到重点，这就需要有相应的见识来梳理材料，这种要把客观性介绍和主观性理解结合起来的情形，对于那些进行译介述评的人很重要。同理，卢絮来回溯这一过程，展示当初那些译介者的工作业绩的时候，也同样是重要的。某种程度上卢絮的工作可能更庞杂，因为当初的译介者只要紧紧跟踪某一两位人物就可以了，卢絮的工作则是要把当初的译介者群体的工作加以回溯，而且心里还需要做出一些权衡，譬如同样译介格林布拉特，不同的人选择的侧重点不同，甚至对其意义、价值的评价也不一致，那么这里进行取舍其实是有困难的，它既包括学识上的困难，又包括涉及具体的人和事之后，不便臧否的困难。

第二个层次，是对新历史主义批评在中国的本土化的梳理。它也可以

细分为两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对新历史主义批评直接地进行研讨，探讨它的理论上的诸多问题，譬如新历史主义只是一种研究方式还是涉及了思想倾向，新历史主义和可以作为先驱者的福柯等人的学理上的渊源等，这些问题其实在欧美国家也是存在多种不同解说的，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和难度。第二个方面是和新历史主义有关联的中国本土的文化诗学的研究，这方面也有难度，除了理论上说问题要辨析之外，中国的文化诗学虽和新历史主义有关，但它还和多年前引入中国的文学社会学有关，并且作为中国本土的文学研究，它有文学以外的考量，包括可能需要考虑结合到中国的传统文化资源，从中国古代的诗文评中寻求相关依据，需要有作为思想指导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等等，因此中国的文化诗学不是新历史主义批评的中国版，而是中国文化诗学受到了它一些影响，同时也有自己的特性，在这里做出比较、甄别，从中做出一些思考，应该说是有一定难度的。

第三个层次，则是尝试采用新历史主义批评的方法来对中国当下的文学和影视作品加以审视。这种尝试具有一些开创性，即一般的学位论文在介绍乃至分析某一文学研究方法、派别之后，就算大功告成。其实卢絮也可以不进行这种工作，那么，目前这种有些“画蛇添足”的做法意图何在呢？首先，目前的一些中国作家已经具有文学观念上的全球化视野，譬如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就从福克纳和马尔克斯创作中获得了很大启迪，即当今中国的文学已经处在世界的整体的文学潮流中，国外的文学创作以及文学的研究方面的思想，也会渗透进来，影响到作家们创作的思考，甚至成为主人公意识的一部分。在这方面影响最大的也许是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对这些受到影响的作品采取相应的批评来加以剖析，应该算是对其所含之意的一种揭示。相对说来，新历史主义批评的思想在作家创作方面还不确定有多少直接影响，如果对这些没有明确的新历史主义意识的作品采用新历史主义批评的路径来加以审视，就有冒险的成分。言其为冒险，第一个意思是是否合适，是不是会张冠李戴、削足适履等的不合拍？对此，卢絮自己感觉好像可以读出一些东西，这样的话，能够由某种途径有所发现，应该就是文学研究追求的方向，因此，这种尝试是有道理

的。冒险的第二个意思，涉及文学研究的方法论，有些学者非常反对以西方文论的范畴、体系、方法来阐释、说明、评价中国的文学作品，认为不妥：假如批评不当，本身就是不匹配，假如确实还有些意思，那么所做的事情相当于在中国文学的领域证实了西方文论批评话语的普遍有效性，而这样做的后果是中西的文学研究领域的交流中，中国文论与批评更加处于弱势地位，并且这种弱势还是自己酿造的。对此可能的意识，我想，有时候自卑心理会以一种极度的自傲，或者蔑视、敌视他人的姿态出现，它如果成为我们进行文学思考的尺度，那是很可怕的，也是很可悲的。

到了这篇“序”应该收尾的时候了。我想起著名学者童庆炳先生为他学生的著作写序常用的套路，即在整体评介了著作之后，会说“某某还年轻，未来的学术道路还很长”一类，算是对著作中可能存在的瑕疵作一个包容式的评语，这里体现的是老师对学生的包容。不过，一本书的用途是面对读者才得以体现。读者阅读一本学术书籍，主要还是看这本书究竟写了什么，是怎么来写的，阅读之后可以有什么收获。至于书的作者状况一般并不在意，也与阅读没有直接关联。因此，虽然卢絮也是青年学者，在学术之路起步不久，但我想说她的这本书在资料参考方面是做得不错的，通过阅读这本书，中国的新历史主义批评的概貌有了整体的展现，另外就是该书不是简单地列举现象，而是对于论题中的问题作了自己有一定深度的思考，由这种思考可以让读者在阅读中受到不同程度的启迪。

是为序。

张荣翼

2015年3月12日

目 录

序	(1)
导论	(1)
一 关于新历史主义的概念界定	(1)
二 关于西方文论本土化研究	(5)
 第一章 西方新历史主义的“源”与“流”	(21)
第一节 新历史主义的缘起、内涵与特色	(22)
一 新历史主义的理论缘起	(22)
二 新历史主义的理论内涵与特色	(28)
第二节 新历史主义的理论贡献与当代意义	(36)
 第二章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新历史主义在中国	(43)
第一节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本土文化语境与文学土壤	(45)
一 1986—1992 年的文化语境与文学土壤	(45)
二 1993—1999 年的文化语境与文学土壤	(51)
第二节 投石问路的引介期(1986—1992)	(56)

一	理论的翻译与介评	(56)
二	阶段性特征与效果	(63)
第三节	沉寂平稳的发展期(1993—1999)	(65)
一	理论的翻译与述评	(65)
二	新历史主义与新历史小说、诗歌创作	(81)
三	新历史主义与历史影视剧创作	(92)
第三章	新世纪新历史主义在中国	(96)
第一节	新世纪本土文化语境与文学土壤	(97)
第二节	研究高潮的初步涌现(2000—2005)	(103)
一	关于新历史主义理论本身的探讨	(105)
二	新历史主义与新历史小说	(112)
三	新历史主义与历史影视剧创作	(121)
第三节	研究高潮的继续推进(2006—2012)	(125)
一	关于新历史主义理论本身的探讨	(128)
二	关于新历史主义与新历史小说	(138)
三	关于新历史主义与历史影视剧	(145)
第四章	新历史主义与中国文化诗学的比较考察	(152)
第一节	中国文化诗学的兴起、发展与特点	(153)
一	中西文化诗学研究背景回顾	(153)
二	中国文化诗学研究发展综述	(155)
第二节	新历史主义与中国文化诗学审美意识比较	(164)
一	关于文本审美	(164)
二	关于文化审美	(167)
三	关于审美与现实	(170)
第三节	新历史主义与中国文化诗学历史意识比较	(173)
一	理论缘起	(173)
二	历史记忆与文学记忆	(174)

三 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	(178)
四 历史真实与文学真实	(182)
第五章 新历史主义视域中的中国当代文学与影视作品分析	(186)
第一节 个体生命的突围:苏童小说的新历史主义解读	(188)
一 苏童小说、新历史主义与文化语境	(188)
二 在历史与现实之间	(192)
三 个体在历史存在面前的困顿	(197)
第二节 民间历史的胜利:莫言小说的新历史主义解读	(204)
一 莫言小说、新历史主义与文化语境	(204)
二 狂欢的自由世界	(209)
三 民间历史的建构	(220)
第三节 历史的影像呈现:《南京!南京!》与《王的盛宴》的新历史主义解读	(227)
一 关于新历史影视剧	(227)
二 坚硬历史中的柔弱个体	(228)
三 历史的个人化与诗化	(233)
结语	(239)
参考文献	(243)
附录 1	(260)
附录 2	(263)

导 论

一 关于新历史主义的概念界定

关于“新历史主义”一词的来历，国内学界有个较为统一的看法：1982年，斯蒂芬·格林布拉特为《文类》（*Genre*）杂志的一个文艺复兴研究专号撰写了导言，并宣告其运用的新批评方法为“新历史主义”。这被国内学界称为新历史主义的一次“集体宣言”^①。但是，当时《文类》杂志并没有为“新历史主义”开辟专号（*Special Issue*），而是一个专题讨论（*Special Topic*），研讨的题目是《文艺复兴时期形式的权力》（*The Power of Forms in the English Renaissance*），其中刊登了由格林布拉特组编的几篇文章。这说明“新历史主义”在当时还没有成为一个研究流派，这也不是所谓的“集体宣言”。格林布拉特在这篇导言中第一次使用“新历史主义”一词，目的在于凸显其以文本为基础（*text-based*）的历史主义原则，以区别传统文学研究中的历史主义方法和美国新批评

^① 此种说法可见：章《什么是新历史主义》，《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4期。王岳川《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95页。陈厚诚、王宁主编《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461—462页。明亮《新历史主义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变异》，《世界文学评论》2007年第2期。

研究方法。其次,“新历史主义”一词也非格林布拉特首创,另一位美国批评家威斯利·莫里斯(Wesley Morris)在1972年出版过一本名为《走向新历史主义》(*Toward a New Historicism*)^①的文学批评著作。当时美国新批评已颇受质疑,但其形式主义研究套路早已渗透到文学研究的各个方面,此书的作者实际上对文学研究中的历史主义态度持反对意见。因此“新历史主义”一词所指与格林布拉特大相径庭。国内有学者指出:“新历史主义一词是加拿大批评家麦肯利(Michael McCandles)在1980年研究文艺复兴文化的论文中首先使用,但没有引起足够的反响。”^②不论这个词由谁创造,赋予它重要理论价值和意义的却是格林布拉特,本书所称的西方新历史主义,其内涵和外延就是指以格林布拉特为代表的美国新历史主义。

至于“新历史主义”一词如何被介绍和引进中国,被国内学者获悉,研究者们有较为一致的说法:王逢振撰写的《今日西方文学批评理论》(1988)第一次向国人介绍了新历史主义。张京媛博士主编的《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1993)是国内第一本新历史主义译文集。在译介和传播新历史主义的初始阶段,我国学者盛宁、杨正润、韩加明、王岳川等表现非常活跃。^③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看,“新历史主义”第一次被中国学者提及,可能最早要见于著名学者、翻译家王佐良所写的一篇游学杂记——《伯克莱的势头》中,这篇文章当时被刊登在《读书》1986年第2期上,伯克莱指的就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也就是新历史主义的发起者格林布拉特任教的学校。这篇文章记录了王佐良先生在那里的游学见闻,也谈到了伯克莱在美国大学中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当然,新历史主义没有在作者的深

① David Harris Sacks, *Imagination in History*, *Shakespeare Studies*, 2003, ProQuest, Research Library, p. 85.

② 傅洁琳:《格林布拉特新历史主义与文化诗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08年,第6页。

③ 持有这种看法的文章可见:陈厚诚、王宁主编《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496页。辛刚国《新历史主义研究述评》,《学术月刊》2002年第8期。张秀娟《断裂性问题与新历史主义》,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2006年,第4页。于永顺、张洋《新世纪以来新历史主义在中国的接受与建构走向》,《艺术广角》2007年第5期。王进《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格林布拉特批评理论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13页。

人探讨之列，两年之后，王逢振在其所著的《今日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十四位著名批评家访谈录》对当时在美国已有相当发展势头的新历史主义有所提及，但并未分章描述，而只是提到了相关批评家对于新历史主义的看法。例如，简·汤姆斯金（Jane Tompkins）、弗兰克·兰垂契亚（Frank Lentricchia），还有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和海登·怀特（Hayden White）。^① 令人遗憾的是，他把海登·怀特称为新历史主义批评家，却忘了更重要的一位代表，即当时在美国已有相当影响的格林布拉特。

实际上，国内大多数学者把海登·怀特和格林布拉特并列为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甚至有人认为是海登·怀特的文章让国人初识了新历史主义。于永顺、张洋提道：“1987年10月在中美第二届比较文学年会上，北京大学杨周翰在《历史叙述中的虚构——作为文学的历史叙述》中赞同新历史主义代表人物海登·怀特的‘历史叙述有某种情结结构和叙事结构’的观点，这是新历史主义在中国的首次亮相，它也预示了一个新的历史批评时代的到来。”^② 傅洁琳指出：“北大研究生刊物《学志》于1990年率先刊登了海登·怀特的《评新历史主义》，是最早翻译介绍新历史主义理论的文章之一。”^③ 毋庸置疑，海登·怀特是当代西方最著名的历史哲学家之一，他的代表作《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Europe*）1973年于美国出版，在西方学界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他之所以被文学界所熟悉，是因为他一直致力于阐述文学叙事与历史叙事的共通之处，摒弃历史的科学性而强调历史的诗学原则。海登·怀特引领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历史哲学领域的语言学转向，同时也将历史主义的思想带入了文学批评领域。一开始便相当关注文学批评家格林布拉特所提出的新历史主义，他认可新历史主义对于轶闻趣事的新颖阐释，但同时，怀特评价新历史主义并“没有什么

① 参见王逢振《今日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十四位著名批评家访谈录》，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或王逢振《交锋：21位著名批评家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② 于永顺、张洋：《新世纪以来新历史主义在中国的接受与建构走向》，《艺术广角》2007年第5期。

③ 傅洁琳：《格林布拉特新历史主义与文化诗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08年，第10页。

独创的地方”，新历史主义只能说是文学批评中的“一个现象”，不能说是“一种新的理论”^①。我们从他的著作等可以看出，海登·怀特的兴趣是在元历史理论上思考文学与历史叙事问题，或者说他始终在西方人文学科的语言学转向的影响下进行历史学审美层面的研究。

不可否认海登·怀特的影响力和他的历史叙事理论的价值，但同时我们应该意识到，无论是理论层面还是方法实践层面，他和格林布拉特所提倡的新历史主义是有相当差距的。实际上，海登·怀特从来没有承认过他自己是新历史主义者，美国学界也不认为他属于新历史主义阵营的一员，无论是格林布拉特，还是主编过两个版本的《新历史主义》一书的阿兰姆·威瑟（H. Aram Veesser）都很少提及他。我们在路易斯·蒙特罗斯（Louis Montrose）或尤根·皮埃特斯（Jürgen Pieters）等研究新历史主义的国外学者的文章里也几乎看不到海登·怀特的名字。然而，如前文所述，国内学界，尤其是文学理论界对海登·怀特非常熟悉，海登·怀特的历史叙事学通常被看作新历史主义的理论来源之一，而他本人与格林布拉特一并成为中国学者心目中的新历史主义掌门人。这是一种“错觉”和“误读”。

上文提到的1987年杨周翰的文章观点主要来自于海登·怀特，但并没有把他归于新历史主义者；1988年出版的王逢振的书里把海登·怀特直接称为新历史主义批评家；1993年，张京媛主编了国内第一本，也是迄今为止为数极少的新历史主义论文集之一：《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张京媛在前言中以绝大部分的篇幅介绍和评价了格林布拉特的研究，并没有提及海登·怀特。可这本论文集只选了格林布拉特的一篇文章，海登·怀特的文章有四篇，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有两篇，剩下的几篇文章也多是对新历史主义进行质疑和批评的。同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世界文论》杂志社编辑出版了《文艺学和新历史主义》，其中只有五篇有关新历史主义的论文。这两本书无疑是国内近三十年来研究新历史主义的首选参考书，极具开拓性意义，但是仔细考察一下这样的译文选择，不禁让人觉得遗憾。由于海登·怀特早已名声在外，其研究领域又涉及历史、文学和哲学，当时他的影响力的确要高于

^① 王逢振：《交锋：21位著名批评家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62、364页。

格林布拉特, 詹姆逊同样如此, 不知这是不是编者当时的考虑之一。但这样的编排却给了没有能力阅读第一手资料, 而完全依靠此书来窥探国外新历史主义研究现状的学者们一个错误的信号: 认为海登·怀特是新历史主义的主力干将之一, 这其中可能还包括詹姆逊等人。另外, 赵一凡、盛宁和王岳川等学者^①分别撰文介绍和评价新历史主义, 把海登·怀特和格林布拉特作为新历史主义的领军人物并列在一起讨论。以上这些学者的许多观点被后来的研究者甚至教科书毫无怀疑地不断复制, 以致让人产生了“错觉”和“误读”。

本书主要以格林布拉特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在中国的研究状况为思考对象, 但不免涉及有关海登·怀特的研究文章, 笔者把它当作西方文论在中国文化和文学土壤中的一种变形, 同时这也是在西方文论本土化过程中, 中国学者的一种策略性选择的结果。还值得一提的是, 格林布拉特在提出新历史主义之时, 没有料到它会在美国甚至欧洲掀起一场轩然大波。正因为如此, 1986年他把“新历史主义”称为一种“文化诗学”。其实, “新历史主义”一词早已深入人心, 而“文化诗学”在西方并没有流传开来(笔者曾用 cultural poetics 或者 poetics of culture 在 Springer、ARL 和 PQDT 等数据库查询, 相关文章非常少见), 学者们还是乐于用新历史主义一词来指称格林布拉特等人的研究。然而, “文化诗学”一词在 20 世纪 90 年代被中国学者借用后, 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话语和批评实践, 近年来在文化研究的浪潮席卷下, 更多的学者参与到中国文化诗学的研讨中来, 希望把这个西方“舶来品”中国化。

二 关于西方文论本土化研究

(一) 关于“西方文论在中国”的研究

西方文论(包括苏俄文论)进入中国已有一百多年历史, 伴随着每一次国内政治、思想运动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特征和性质。实际上,

^① 参见盛宁《历史·文本·意识形态——新历史主义的文化批评和文学批评刍议》,《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5期。盛宁《新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历史真实》,《文艺理论与批评》1997年第1期。王岳川《海登·怀特的新历史主义理论》,《天津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

西方文论早已取代中国传统文论的主导地位，成为现当代中国文论的主要思想来源，并导致了所谓的中国文论的“失语症”和“与传统断裂”等问题。而这些问题又促使我们不得不去重新思考和梳理西方文论在中国的生存、传播和发展过程。实际上，这应是西方文论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它如何促成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型，又如何被中国学者有选择地吸收和改造，成为现代中国文论的有机组成部分，都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

在这方面先行一步的研究者人数不多，且起步较晚。刘庆福在《苏联文学》1988年第4期上发表《高尔基文论在中国》一文，其中以翔实的资料 and 统计数字说明高尔基的文艺思想在我国文艺发展中的重要影响。许祖华于《外国文学研究》1992年第2期发表《西方文论与五四新文学的本体论》，指出中国近现代文论家们移植某些西方文学理论术语的情况。吴学先在《哈尔滨师专学报》1994年第3期上发表《西方文论在中国的引进过程——兼评〈西方文论史〉》。这篇文章分别概括了国内引进西方文论的五次高潮及各自特点，指出西方文论在中国的引进过程是一个迄今为止不曾有人触及的领域，也是需要查阅大量资料的难度较大的课题。这几位学者的研究开辟了研究西方文论在中国的新路子，可惜影响力不大，后继者不多，一直到世纪之交，这方面的研究才逐渐成为热点。世纪之交，集中讨论西方文论在中国百年生存状态的述评文章逐渐增多。例如，代迅对西方文论近百年在中国的基本脉络和影响、中国文论在接受过程中的主体选择、民族身份认同等研究方面进行了认真的思考。他认为：“西方文论已经取代传统的汉语文论资源而成为中国文论的主要思想库。……而中国文论近百年所发生的巨大变革，比此前中国文论变革的总和还要大，这和西方文论的输入是分不开的，这种输入迄今仍未失去‘窃火者’的意义。”^①应该说这些总结和评价都是非常中肯的，作者在世界政治和文化格局的全球视野下，观照中国对西方文论的本土化选择，提倡用合理

^① 代迅：《全球视野中的本土化选择：近百年西方文论在中国》，《文艺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